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海峽兩岸引發各種紀念浪潮。我刊歡迎海內外作者惠賜有關辛亥革命的史學論文，亦歡迎關於辛亥百年紀念的隨筆和評論文章。

——編者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也談共和國史研究

謝泳〈內部文獻與共和國史的研究〉(《二十一世紀》2011年4月號)一文，探討了如何在現實條件下進行共和國史研究的一些技巧，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筆者在此想結合自己研究「文革史」的體會作些補充：

第一，轉換研究思路，拓展考察視野。在史學研究中，史料的類型和來源往往會隨着研究主題和研究對象的改變而改變。以共和國史研究為例，要想了解中央高層的決策過程，除了依賴檔案資料和「內部文獻」之外，辦法實在不多。但如果想要了解我們自己所在的地區、單位發生的故事，以及普通人的經歷與感受，獲取信息的渠道和方法就寬泛得多了。

第二，擴大搜索範圍，通過多種史料的發掘與互證，再現歷史事實。社會史視角的一大特點，在於以普通人群的思想與活動為考察主體。因而，一些個人記錄如日記、信函、工作筆記、揭發交代材料等，都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以文革時期為例，一些非正式出版物和宣傳品如群眾組織報刊、傳單、大字報等，也構成史

料。這些史料往往涉及重要人物、事件、會議、談判和協議，有時還包含內部傳達的中央文件、中央領導人談話抄件，因而實際上具有檔案資料的某些功能和屬性。

此外，研究當代史還有一個很大的技術優勢——即我們有可能接觸到大量的親歷者和當事人。口述史料在共和國史(尤其是「文革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源於一些秘密指示、談話與當時的輿論宣傳相互抵觸，而這些鮮為人知的信息，往往是理解重大歷史轉折的關鍵。

總而言之，研究者採用的視角和方法很重要。即使將來歷史檔案全部開放，社會史的視角和口述歷史的方法依然具有其獨特的價值和意義。當然，所有史料(包括檔案資料)都需要加以檢驗和互證。

董國強 南京

2011.4.27

國際視野與國情意識的典型結合

讀罷〈勞動政策與社會政策的非典型分離〉(《二十一世紀》2011年4月號)，掩卷深思，岳

經綸的國際視野與國情意識的密切結合，是本文的亮點。

岳經綸開篇明確了政府「維穩」機制和勞工利益訴求之間的巨大張力，從社會政策的角度展開對中國勞動關係轉型的理性思考。在國際視野和現實國情的關照之下，岳認為，「中國勞資雙方之間的相互衝突，反映的是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之間的衝突」。

岳經綸引用考夫曼(Franz-Xaver Kaufmann)從法律傳統入手展開的對勞動關係的分析，對社會政策進行分析歸類；沿襲艾斯平-安德森(Gøsta Esping-Andersen)對福利體制的分類，甚至比對美國、瑞典和德國的勞動聯盟結構，我們似乎可以把他歸類為「歐風美雨」薰陶之下的「西方派」。但是，岳的「典型」之處在於其能夠從根植於中國現實的問題意識着眼，條分縷析地梳理中國勞動保護體制的變遷，並提出切實可行的舉措。不過，筆者仍然自我糾結於那依舊虛無飄渺的「第三條道路」，難以阻遏對「中國的西方化」或者「西方的中國化」這一命題的追問。

唐經緯 南京

2011.4.30

勞工階級聯合有力量

陳峰的〈罷工潮與工人集體權利的建構〉(《二十一世紀》2011年4月號)一文為我們展示了兩個主要觀點：

第一，工人集體權利的建立，同社會中的民權／自由權的存在和政治權利的存在與發生是不可分割的。工人聯合的最低限度必須依靠結社自由。第二，中國已基本建立了一個在相當程度上囊括勞動者個人經濟權利的權利體制，從而進一步提升了國家限制、防範和化解工人動員的能力。

但文章並未從根本上回答建構富有中國特色的工人集體權利的改革路徑。作者只是抽象地談到：中國勞動權利體制建構的意圖是要通過系統的個人權利立法來保障勞動者的利益，但這種權利體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勞資力量失衡的狀況，不符合勞資權力關係的本質要求，無法形成制約資本的力量，無法真正從根本上保護工人的利益。只有通過集體權利的賦予即「賦權」，工人才能爭取法定個人權利以外的利益。

筆者認為，要探討「勞工階級聯合有力量」的本質意義和建構路徑，須重視兩個重要議題：一、系統考察1920至30年代的中國城市工人運動史，它為現今工人罷工的政治效應帶來有益啟示，尤其是李立三路線的失敗和國民黨勞工政策的有效性；二、零散的或整體的工人罷工運動不僅與民主轉型有巨大聯繫，而且與產業革命密切相關，更與政黨能否兌現執政承諾休戚相關。

楊志軍 湖州

2011.5.8

外交是要現實還是要風度？

沈志華、董潔的〈中朝邊界爭議的解決：1950-64年〉(《二十一世紀》2011年4月號)一文對中朝1950至60年代關於邊界問題的衝突和解決進行了深入而細緻的考察，讓作者和讀者感興趣的是：中國為何會做出如此大的讓步？

在作者看來，這樣輕易而大幅度的讓步在現代國際關係中是不成熟和退步的表現。作者深入挖掘中國政府如此行為的文化根源，最後將其歸結為傳統「天朝」觀念的餘波與現代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思想的完美結合。這一洞識可謂深刻，但又讓人有種意猶未盡之感。

從根源上思考，孔子名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幾千年來深深刻在士大夫的心上，「天朝」觀念不過是義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的一種表現而已。如果對於計較私利行為的蔑視成就了君子的大度和優越性，對朝貢者的倒貼則成就了「天朝」的優越和慷慨。傳統朝貢體制中對經濟利益的不計較正是君子優越風度的表現。

而這種君子心態與現代社會主義公天下思想的結合，使其更加從精神和情感，而不是現實功利來處理外交問題。愈是同盟兄弟就愈注重情感和君子情誼，而不是各種利益。中國政府最頭疼和盟友在各種利益上的交涉和談判，這會將自己拖入小人的境地，為君子形象作出的犧牲又不可能長久承擔。

賈慶軍 寧波

2011.5.2

轉軌社會與勞工抗爭

當代中國勞工生存與發展的艱難處境，是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過程中攫取、分化與失約的生動映照，而不斷尖銳的勞資矛盾更愈發表明經濟發展亟需政治與社會制度的相應革新。〈當代農民工的抗爭與中國勞資關係轉型〉(《二十一世紀》2011年4月號)正是從制度範疇探析「新生代」流動勞工與鄉村、城市、國家、資本的不同關係。

在「新生代」流動勞工群落中，歸屬與網絡具體表現為文化、教育背景等非正式制度所塑造的身份認同，以及受制於正式組織與規則的網絡聯結；這種認同與聯結既產生集體要求，也產生用以表達其要求的方式。富士康公司與南海本田公司勞工抗爭的鮮明案例是這一命題的具體印證，「準軍事化工廠專制政體」與「常規工廠專制政體」在組織結構與規訓方式上的差異，使身處其中的勞工在抗爭方式與策略選擇上呈現「原子化／集體行動」與「極端／理性」的截然分化。

該文在「新生代」勞工(微觀個體)、工廠專制形態(中觀組織)、政策環境(宏觀制度)的循序思路下，從勞工抗爭的實證觀察切入，探討勞資關係轉型何以勢在必行，進而指出勞工內生力量的培育與正式制度的構築，對於流動勞工生存發展的空間與權利的重要意義。

馬原 天津

2011.4.29